

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一项理论解释¹

任琳 尹继武*

摘要：金砖国家成为新近国际社会颇具特性的全球治理合作平台之一，但国际关系学界尚未有系统的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解释。金砖国家的合作起源于外生背景下的国家能动性和实践，其理论解释逻辑包括基于功能—规范和内生—外生维度下的四种解释变量，及其相应的体系、单元报偿结构的判断机制和外生、内生未来影响机制。在国际制度非中性和金砖国家政治经济崛起的背景下，金砖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逐渐增长，国际地位和利益追求的共识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进而产生联盟组织的信任，推动金砖国家组织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发展。金砖国家合作的理论解释拓展了功能型和发展型合作的前提认识，超越了传统的同质性合作理念，突出了金砖国家内生能动性对于合作博弈的重要性，体现了因素和机制解释的有机统一。金砖国家合作的综合理论解释，对于如何看待金砖国家的进一步发展等政策议题具有一定的知识启示。

关键词：合作；金砖国家；功能主义；规范主义；内生；外生

¹ 本文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

*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732）；尹继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089）。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安全观视野下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建构及其路径选择”（项目编号：14CGJ012）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理论解释”的资助，特此致谢。感谢撰写和修改过程中田野、蒲晓宇以及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文责作者自负。

一、问题的提出

2001年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奥尼尔（Jim O' Neill）首次提出了“金砖四国”的概念，旨在为未来投资者在全球寻找具有投资机会的国家或地区。BRIC分别取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英文首字母。经过几年时间，国际社会已经普遍使用“金砖国家”概念来界定新兴市场国家这一特殊国家群体。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系统性危害，客观上推动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新兴国家同样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加之既有国际制度具有非中性，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存量损失依旧。系统性危机的爆发客观上使新兴国家进一步认识到实现群体内合作，维护自身利益，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意义。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于2009年首次召开，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形，金砖国家机制从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之一。²近年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金砖五国”也逐渐将“金砖国家”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因而金砖国家从一种外在的身份标签转化成为一种内生的共识。

金砖国家机制体现出一种国际合作的新形式，它一方面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合作模式，表现出了一些独特的制度形式，尤为重要是金砖国家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和竞争性，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同质合作模式，而相关对于金砖合作的质疑也是基于此；另一方面它汇集了多维度的合作动因，也因此引发了我们对合作起源基础理论的深入反思。围绕金砖合作的发展历程、特色、属性及金砖国家间合作对于全球治理的意义，学术界均有大量的讨论，然而尚未有系统地从合作起源理论入手的完备解释，也缺乏对金砖合作的案例进行理论抽象和总结的成熟研究。³鉴于此，金砖国家的合作具有哪些新特征？为何金砖国家能够超越彼此

² 《“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在叶卡捷琳堡举行》，《人民日报》2009年6月17日第1版。

³ 陈进主编：《金砖国家经贸合作发展报告》，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3年。顾云深主编：《金砖国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林跃勤主编：《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013年。李扬主编：《“金砖四国”与国际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黄仁伟：《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当代世界》2011年第5期，第24-27页。卢锋等：《金砖五国的合作背景和前景》，《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2期，第1-21页。朱杰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国际观察》2014年第3期，第59-73页。Kwang Chun, *The BRICs Superpower Challeng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nalysis*, London: Ashgate Pub Co., 2013. Miles Kahler, "Rising Powe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Negotiating Change in a Resilient Status Quo,"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3, 2013, pp.711-729. Ramesh Thakur, "How Representative are BRIC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5, No.10, 2014,

之间的差异，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合作治理机制？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又具有何种理论上的新知识和启示？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试图回答的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理论问题。本文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叙述逻辑，首先回顾传统理论中的合作起源问题，挖掘影响合作的诸多变量及其相应作用机制，进而剖析金砖合作的特殊表现，最后总结金砖合作对一般意义上合作研究的辩证式启发。

二、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理论脉络、变量类型和解释机制

各个学科中，对合作起源、信任心理动因的追溯都是经典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国际关系中都曾经分析过合作的起源问题。本节通过回顾和整理这些分析的基本脉络，尝试寻找合作起源的基本理论元素，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合作起源的基本变量和作用机制，进而为下节对金砖国家合作进行案例研究提供基本理论分析框架。

（一）合作起源的理论

首先，生物学中的合作研究。人际合作行为奠定了人类在自然界高级动物的地位。在生物学中，解释合作起源的理论包括利他主义（出于亲属关系、基于种族同一性、出于互惠交换关系）、互利共生为代表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认为在交往和进化的过程中，同一性、同情心、成功的文化、规则和制度可以塑造合作，而利己主义则反对这种合作起源于同情心、群体文化的逻辑。从互利共生的利己主义来看，合作是一种有利的“利己策略”，利己主义接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因此，利己主义看来，合作博弈选择是受利己的自我利益驱使的。然而，即使达尔文在进化论中也强调利他合作的重要性，“在人和低等动物之间的种种差别之中，最为重要而且其程度又远远超出其他重要差别之上的一个差别是道德感或良心”⁴。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中尝试在两种理论路径之间搭起桥梁，将无私利他、谋求合作归因为利己，“在一个成功的基因中可以期待的显著特征是无情的自私。这种基因的自私将经常使得个体自私行为的增加...让我们试着传授慷慨和利他主义，因为我们生来自私”⁵。此外，生物学也借用了重复博弈、交往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经典理论，认为利他合作的发起者

pp.1791-1808. Christian Brüttsch and Mihaela Papa, “Deconstructing the BRICs: Bargaining Coalition, Imagined Community, or Geopolitical Fad?”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6, No.3, 2013, pp.299-327.

⁴ [英]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第一篇。

⁵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

往往具有一种“高支付”的优势，使其能够更成功地进化⁶。但是，一些合作的制约因素（比如恐惧等）也具有进化的意义，因此虽然有利他合作的可能，但如何消除消极情感等不确定性因素也是一项重要的合作起源的议题。⁷

其次，在经济学的合作研究中清楚可见“理”和“情”两个流派的分野。在经济学里，单一理性以其理论简洁性具有解释优势，在解释话语体系中长期占据决定性地位。理性选择模型也一直是经济学解释合作动因的核心理论。行为体做出合作的理性选择是基于彼此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在根源上说，事物的可互补性导致群体合作行为的产生。如果可替代的选择不存在，行为体倾向于选择具有互补性的合作伙伴，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行为都可以溯源到效用最大化的原始动机⁸。情感派批评了经济学里纯粹效用成本导向型的理论分析，开始反思并着手拓展理性的内涵与外延。“人类的理性从来就不是冷酷的、不带情感的理性……人们的心理距离越小，合作发生的概率就越大”⁹。正如道金斯认为利他也可以利己，不一定有互补获益才有合作。通过思索自利的“经济人”如何走上合作之路，又是如何乐意或者被动地促进公共利益的提高，人们开始反思当初对亚当·斯密的理解是否存在偏颇之处。仅仅看到理性，而忽略和否认情感的理论解释作用，可能会导致经济分析偏离事实。实际上，斯密在之前的著作中也强调合作的动力包括同情心，而非单纯的利己思维¹⁰。

再次，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合作研究。在将宏观与微观层面相结合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中，合作是行为体间互动以及群体形成的重要形式和环节。经济学中理性主义过于对理性、自私和利益的强调，在此路径中得到一定的平衡，即重视情感因素对于合作的重要性。这种情感包括信任、身份的共同界定和认知以及心理意义上群体的归属感等¹¹。具体言之，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路径将合作的心理基础看做是合作起源和形成的先决条件。当然，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认为，合作并不一定必然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是对于关系的持续稳定的预期。¹²但信任的形成依然是合作的重要条件，特别是能够决定合作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⁶R. D. Alexander, *Biology and Human Affai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9. R. D. Alexander, *The Biology of Moral Systems*, Hawthorne, NY: deGruyter, 1987.

⁷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Fear (and Trust): Or Why 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fficult?” Manuscript, 2011.

⁸ [美] 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3 年，第 1 篇。

⁹ 汪丁丁：《人类合作秩序的起源与演化》，《社会科学战线》2005 年第 4 期，第 39-47 页。

¹⁰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¹¹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101-131 页。

¹² [美]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只是暂时性、战略性等短期性的合作可以建立在信任缺失的基础之上¹³。在决定合作的微观信任起源的诸多变量中，同质性、交往密度以及共同应对外在压力等具有重要作用。比如，相关行为体间同质性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产生信任；行为体间交往互动密度越大，则越有可能增加行为体间对于相互战略意图的透明度，增加利益的相互依赖度，减少交易成本；而对于共同的外在任务和压力的一致性认识，是产生行为体间相互信任的重要外生条件。

最后，国际关系中对国际合作的研究。国际合作一般可以区分为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从领域来看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合作。就合作起源的理论解释而言，多边合作一般与国际制度研究紧密相关。国际合作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基于无政府状态的体系压力，强调报偿结构、未来影响以及行为体数目对于合作的重要影响，这被称为非集中合作理论。¹⁴此后，针对这种过于强调无政府体系特征的合作理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合作研究重新正视制度的作用，试图“将制度找回来”，讨论国际制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从国际法视角的切入，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对于授权、履约和代理等制度执行环节的讨论等。¹⁵既有的国际合作理论，主流路径为理性主义对于合作效应的博弈论分析，重点解析合作的效应与成本，以及背叛成本的克服问题，而对于制度本体重要性的强调，则凸显了合作的制度形式的重要意义。

此外，尽管利他合作一直存在，但既有研究的合作类型大多是对抗性的合作，而金砖合作为代表的国际合作研究呈现了功能性和发展性的合作新特性，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治理的组织形式的一种反映。当全球化带来的复合相互依存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替代“零和思维”，超越“零和博弈”基础上的发展型联盟合作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形态。它体现为全球合力解决问题，例如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进行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等¹⁶。发展型合作维持稳定的条件与传统对抗型合作不同。传统理论中，一般讨论基于规避冲突和风险的合作，形成军事或政治联盟，而忽视了基于获益改善的合作。因此，仅仅盘算一次性的报偿结构，而容易缺乏对合作持续性的考量。后者包括了基于开发合作和应急性

¹³郑也夫编：《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 年。

¹⁴ [美] 肯尼思·奥耶编：《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田野、辛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¹⁵ [美] 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编：《国际制度》，黄仁伟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Barbara Koremenos, Duncan Snidal and Charles Lipson eds., *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¹⁶ [美] 约瑟夫·奈，约翰·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门洪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第 17 页。

合作，从而形成联盟、团体、伙伴关系等，将合作的持续性纳入考虑范围。一旦具有秩序稳定作用的制度达成并被合作方认可，且获益稳定，发展型合作可以是自我实施的（Self-enforcement）。但应急性、战略性的联盟则可能在合作任务结束后崩溃，合作持续的基础不复存在，例如 20 国集团需要思考在危机过后如何维持活力的问题¹⁷。总之，发展型合作关注了合作的可持续性和重复性，在“未来影响”的视角下看待合作，丰富了合作起源研究的理论元素。

（二）金砖国家合作起源解释变量的类型

基于上述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关于合作起源的综述，合作起源的解释最初遵循的是理性主义的逻辑，即利己、理性和自私的微观动因均将合作看作是个体自我利益的实现途径，而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路径更为强调“非理性的”、从属规范路径的情感和信任对于合作形成的重要性。国际合作的“非集中合作”理论和制度理论，强调诸多合作起源和形成的外部变量和作用机制的影响，如报偿结构、未来影响、行为体数目以及制度对于合作的积极意义。而身份、沟通理性的社会学路径，认为行为体间关于合作的共识和信任的形成，是国际合作起源的心理基础。¹⁸总之，合作起源的各种变量相互交织，在不同的情境和条件下，对合作起源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机制也存在差异。

第一种分类标准围绕着功能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分野展开。¹⁹基于功能与规范的角度做出分类，即功能主义的分析变量是基于历史的实践过程，通过系列的国际关系实践（沟通、协商、博弈以及战略互动，经济往来等），从而在逐步的合作中达到确定双方战略意图、利益一致性以及合作可重复等信念。

与功能主义相对应的就是规范的分析维度，聚焦于行为体及其合作的内在信任、共识以及观念的沉淀，规范主义视角下的分析变量具有更多的可持续性和稳

¹⁷任琳：《危机过后，G20 如何把日子过好》，《世界知识》2014 年第 24 期，第 46-47 页。

¹⁸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1, 2000, pp.1-39. Brian C. Rathbun,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¹⁹功能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分析标准，是借鉴于本体论层次物质与理念的区分。功能主义强调理性 / 物质变量的过程实践，进而在实践中克服行为体间的战略意图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增大利益的一致性；规范主义则强调规范、信任和共识变量对于合作的决定性作用。严格来说，结构与功能、物质与规范是两对较为严谨的二分范畴，在此我们对于功能与规范的维度区分，是建立在功能是具有能动性的物质 / 理性因素的认识之上，其潜在的范畴标准是遵循物质与规范区分理念，但更为强调“功能”变量是能够作用于合作形成的物质 / 理性因素。感谢匿名评审人对于功能与规范二分范畴的建议。关于这两类分类标准及其相应的理论讨论，参阅：Karl W.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秦亚青主编：《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

定性，着重对应的是合作的可持续性及其预期。功能主义的分析变量并不排斥如下预期，亦即在多次的正向合作实践后，可能进一步对合作本身产生积极反馈，从而有助于形成一种内在规范，使合作可以自我实施。²⁰基于进化心理学，在非血缘（同质性甚弱）的个体和群体行为中，利他和互惠也可以产生，合作依然可以达成²¹。这种内在的合作规范是对于合作本身价值及其合作机制、方式和途径的肯定。

第二种分类标准讨论的是依据影响合作形成的变量是外生的还是内生，对变量进行划分。²²在这两种因素分类看来，合作的动力既是行为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行为体间共识的主动塑造和安排的结果。传统上我们将外生变量看做是独立于国际合作本身，不受合作影响的变量，因此倾向于从功能主义解析其对于合作的促进影响；而内生变量看做是合作自身所内在的因素或变量，在此意义上内生因素是合作规范和价值所在。

外生解释框架下，主要的影响变量为国际制度以及国际环境或体系的压力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减少交易成本，维系更长远的未来影响，增大报偿结构等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国际权力环境及结构，对于国际合作的形成，具有特定的外在压力的作用。上述几类外生变量，对于国际合作起到的是功能主义的促进作用，某种意义上功能主义的外生理论解释模式也符合由点及面的逐步互惠的合作方式。规范主义的外生变量强调的是国际环境和国际制度被塑造成为国际公认的行为规范，表现为是否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是否建构出公正国际规范。

内生解释强调合作本身对于行为体的吸引力，换言之，这是行为体的内在诉求与共识主导下对国际合作的预期，主要是一种至下而上的合作模式。一般来说，行为体数目越多，就会导致合作形成和维系更为困难，因为增加了交易成本和辨析利益的难度，同时也使得背叛可能性增大，而遭受制裁的机会减少。²³此外，合

²⁰合作的自我实施的基本条件包括行为体有效使用抵押、互惠和问题联系（issue-linkage）等策略。参见：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8-149页。

²¹无论是个体选择还是群体选择，利他主义的倾向都有进化上的理由，虽然短期内不利于利益的实现，但从长期的动态均衡来看是理性的。利他对于维持互惠关系不是必要的，但是互惠起源的基础。[美]亚历山大·J·菲尔德：《利他主义倾向——行为科学、进化理论与互惠的起源》，赵培等译，沈阳：长春出版社2006年。Robert Frank, *Passions within Reason: The Strategic Role of Emotions*, New York: Norton, 1988.

²²内生和外生变量的区分，最早来源于经济学，其标准为是否独立于解释变量。在此我们主要从金砖国家系统内外的区分，对变量的内生和外生属性就行分类，即金砖系统之外的大体系中的变量是外生变量，而金砖系统内部的变量为内生变量。当然，系统的区分也是相对的。

²³ [美]肯尼思·奥耶：《解释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假说与战略》，[美]肯尼思·奥耶编：《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第16-18页。

作的先决条件是行为体之间的政治共识和信任的形成。信任常常取决于同质性，而政治共识则缘起于对行为体之间地位、身份和利益的一致性认识。²⁴正如，金砖国家要求加强发展中国家在既有的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制度中的参与以及话语权的建构，也对于全球金融危机都有合作应对、维护一致利益、谋求共存的需求等。

基于外生和内生以及功能和规范的两类维度划分，我们得出了以下的合作分析变量的类型谱（表1）。其中，落在外生—功能象限里的变量有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国际制度环境；落在内生—功能象限里的变量有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国内政治；落在内生—规范象限里的变量有同质性的同一性、内生共识（地位、身份和利益）；落在外生—规范象限里的变量有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建构公正国际规范。

依据正统的合作理论理解，外生—功能变量和内生—规范变量是最为重要的，就如上文所详细讨论的一样。但是，另外一些不常见的变量类型，比如外生—规范和内生—功能分析变量同样也值得注意。外生—规范大多指体系层面的合作规范文化，而内生—功能大多指行为体或行为体之间的合作策略等。²⁵鉴于上述讨论，我们接下来着重分析上述两类因素的组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金砖合作的起源和形成产生作用的。

表 1 基于金砖国家合作研究的变量类型

	功能	规范
外生	系统外部环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国际制度环境	重复合作的报偿文化、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
内生	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国内政治	同质性的认知、内生共识（地位、身份和利益）

（三）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作用机制（mechanism）

在诸多学科中的合作起源解释中，核心的主线是理性（自私和利益）和非理性或有限理性（情感、信任和规范）之间的分野。结合图表 1 中的举证，合作起

²⁴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Brian C. Rathbun, *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²⁵既有的合作研究大多将合作区分为不同的阶段和议题，或者讨论不同的影响因素对于合作形成的作用，比如信任、同质性、经贸往来、共同威胁等等。相关研究综述：Kate O’Neill, Jorg Balsiger and Stacy D. VanDeveer, “Actors, Norms, and Impact: Rec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7, 2004, pp.149-175.

源变量的谱系覆盖了：外生—功能、内生—规范、外生—规范和内生—功能四大类别。本文关于合作起源的理论解释，首先详细分析了上述的外生解释/内生解释变量和功能/规范解释变量，接下来将具体分析上述不同类型解释变量影响合作形成的作用机制。

将所有影响变量联系起来的是两组作用机制²⁶。具体言之，报偿结构强调的是利益相关性，即行为体能够从合作中获得利益回报，一般可分为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或政治利益的回报，取决于合作的性质和领域。未来影响对于自私行为体进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单次合作会大大增加背叛的风险；而多次合作的预期，则增加了合作的可能。综上，两种主要的作用机制包括：**对保持报偿结构²⁷的判断；对未来影响的认知（表 2）**。前者强调外部与内部客观存在是合作的起源；后者则坚持既有的认知结构对合作具有塑造作用²⁸。

第一，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客观判断。报偿结构是指行为体预期未来合作中所获得的奖励是与当下的行为紧密联系起来的，奖励合作的报偿结构能够促进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行为体的行动大致可以分为合作与非合作两类²⁹。合作更多关注集体行为过程；非合作博弈则关注个体行为特征。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合作则重视集体共同利益的实现（集体理性）。两种理性都符合报偿结构的逻辑推理。然而现实情境中，两者相互混杂无法割裂。在多次博弈和完全竞争的状态下，两者逐渐融合。集体理性也并非一定与个体理性相违背。博弈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个人获益，而博弈过程则是寻找最佳的个体获益方式。如果合作博弈比单枪匹马的博弈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合作则成为符合个体理性的更优选择，集体理性（包括利他思维、合作文化等）与个体理性并不矛盾。外生—功能和内生—功能变量都从属于对保持报偿结构的判断机制。

第二，对合作未来影响的基本认知。这主要是针对单次博弈或合作所带来的背叛或消极影响，即合作是否可以重复或持续。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行为体的

²⁶ [美] 肯尼思·奥耶：《解释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假说与战略》，第 5-16 页。本文的作用机制解释，主要借鉴国际合作研究的非集中合作理论，即无政府状态体系之下的国际合作对于报偿结构的认知和未来影响的预期。

²⁷这里主要指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全球体系中的报偿结构。

²⁸正如认知心理学里认为人脑既有的存量知识和结构对人类的行为具有决定作用，在此具体指国家合作行为取决于国家已经内化了的认知。在认知心理学里，图式（schema）被用来形容这种已经被人脑内化的外部世界，在人脑中加工而成显示出来的心理结构。

²⁹我们在本文中研究合作的起源问题，从理论预设上来说是从追溯团体理性的来源。借鉴博弈论中对合作博弈的研究，进一步理清和丰富合作起源研究的理论框架。一般意义上，博弈，包括合作博弈的动因是单一经济理性，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合作理性往往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如合作博弈强调团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

利己、自私的特性，合作如果没有未来可重复性的话，很容易导致背叛或难以形成。衡量未来影响的几个指标包括：其一，合作的长期性与阶段性；其二，重大利益的规则性；其三，关于其他行为体行动信息的可靠性；其四，依据其他行为体行动的变化而做出的迅速反馈³⁰。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或指标是合作的时间范围和重大利益的规则性。基于上述要素分析，一般来说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可能性要远远高于国际安全领域。与报偿结构类似，未来影响对于合作的促进，行为体的预期也非常重要。而要加强这种预期，国际制度的建立及其机制化、规范化，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它有利于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行为体在学习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将规范内化，在个体层面上重塑认同与共识，也会影响到它对合作未来影响的认知。外生-规范和内生-规范变量都从属于未来影响机制。

最终，实现从“报偿结构机制”驱动合作向“未来影响机制”驱动合作的转型，才能使合作常态化。合作不再是每次博弈中斤斤计较报偿结构的算计，而是形成可预期的、让渡的、主动的、习惯性的多次重复合作博弈，即“未来影响机制”发挥主要的潜在驱动作用。如此，就将合作的起源从功能性的报偿判断过渡到常态规范式的合作上来，也就此搭建了合作长期稳定的基础。没有任何一种合作是静态的，合作型博弈中的行为体也处在不断的博弈与让步之中，从前一种机制到后一种机制的过渡，是增加合作稳定性的重要途径，也并非一劳永逸的应对策略。本文分析各种影响合作的因素与机制，试图在理论上为国际合作行为提供参考性建议。

	功能	规范
外生	体系报偿结构(利益的一致性)	外生未来影响(重复合作的存在)
内生	单元报偿结构(利益的一致性)	内生未来影响(认同和共识的存在)

表 2 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作用机制类型

外生-功能象限里的变量揭示了：决定报偿结构的首要因素是体系性的，即客观环境塑造利益结构，即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客观利益冲突越大，那么合作越不容易形成，即使合作形成，也容易产生背叛的行为，导致合作破裂。在此情境中，行为体的辨别能力就特别重要，一方面是辨别出相应的合作报偿结构，认识到利

³⁰ [美]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基欧汉：《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达成：战略与制度》，[美] 肯尼思·奥耶编：《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第 238 页。

益的一致性,其次是辨别出可能存在的背叛的能力和意图等。³¹对于国际合作来说,相关的报偿结构还与议题领域有关,如经济上的互补结构,能够让行为体产生合作带来相应的利益的预期,这种利益的一致性还表现在政治利益或安全利益等方面,因为很多合作更具政治或安全意义。

外生-规范象限里的变量强调的是集体判断对合作的塑造作用。引入外生-规范的分析视角,是因为报偿结构和功能性诉求并非合作的唯一动力。正如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主张的,尽管“系统结构具有重要性,其中包括利益模式、结盟的可能性以及能力的配置……并不意味着此前讨论过的较少的主观性的因素没有作用”,因为“信念通常还是需要加以考虑的”³²。信念影响到行为体对未来影响的预期,从而决定合作能否达成。信念可以是内生的,也可以是在行为体彼此互动过程中逐渐塑造而外生的,后者实际上就是合作规范与文化了。³³外生-规范的变量虽然是行为体的合作信念或文化,但是一种集体信念或文化,即稳定的重复合作的回报预期,实则是报偿文化,也包括对于外生于行为体的体系规范的信念。

内生-功能象限里的变量强调单元报偿结构的即成影响。行为体一方面通过行为体数目、互补性和国内政治等客观因素判断其合作收益;另一方面,在做出判断之后,行为体也有根据判断,主动设计并试图改善报偿结构的意愿,从而将作用力外溢到外生-功能这个层面上。³⁴在这个意义上,金砖国家合作具有主动设计的特征。一方面是金砖是四个/五个国家在西方提出概念基础上的主动合作设计,同时中国在金砖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来看,中国主动创设、推动和设计的国际合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以及金砖国家等。

内生-规范象限里的变量强调的是行为体认知对合作的影响。行为体基于信念做出未来预期,基于共识而合作。在确立政治共识,形成政治信任的情况下,行

³¹共同的外在压力及其认知和共同的任务/使命及其认知,是合作形成的重要结构原因。参见: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第127-130页。[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³²[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³³这里强调的是积极的合作博弈所产生的正反馈,即进一步强化了合作文化与规范,从而对未来的长期合作与收益产生持续的预期。这与“一报还一报”策略和“逐步回报”策略的逻辑是一致的。[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Charele Osgood, *Alternative to War or Surrender*,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2.

³⁴行为体的能动策略对合作及其结构的影响,相关文献可参阅:Kate O'Neill, Jorg Balsiger and Stacy D. VanDeveer, "Actors, Norms, and Impact: Rec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周方银:《国际结构与策略互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6-17页。

为体对于合作是一种主动的理性缔造，因此这种预期是与前述的外生解释是相反的，强调在形成地位、身份、利益共识的情况下，由相关国家主动塑造合作，选择合作的制度形式。在此情境下，国际制度也更偏向于一种理性设计。³⁵同质性是更为基础的内生变量，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为体间对于合作的信任和共识的形成。内生解释剖析合作起源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学习和功能外溢路径，着眼于行为体间关于合作的信任和共识的形成，然后再推进合作的具体实践进程。

三、案例分析：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理论解释

以合作的起源和发展来看，金砖合作的起源超越了地域³⁶和同质性弱³⁷的制约，同时制度形式的选择也较为独特，因此为我们重新审视合作起源提供了理论上创新的可能。本节首先总结了（国际）合作研究的主要分析变量，并依据两个分类维度对这些分析变量进行了类型学划分，讨论不同类型的分析变量组合及其对应的作用机制对于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解释力。

（一）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解释机制 I

第一种解释机制，基于内生和外生的功能因素组合，讨论理性功能主义视角下的体系和单元功能因素对于合作报偿结构的影响。具体来说，体系层面的既有压力和国家层面的动力，增大了金砖国家对于（即使是单次合作中）利益一致性和合作回报的预期，因此金砖合作的形成具备了合作博弈的团体利益一致性。

1. 外生功能因素及其体系报偿结构机制

基于功能主义的理论预期，合作的起源在于应对共同的外部压力和内部问题。系统环境所产生的外部压力，会对行为体间合作的愿望和需求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一方面主要是指由于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特别是相同类型的国家间所面对的政治经济问题较为相似，如果相关国家间的交往密度程度又较高的话，则对于相应外在环境压力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是直接相关，甚至是相似的。³⁸因此，基于

³⁵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强调制度对于克服不确定性，形成高程度合作的理性作用。在此的理性制度设计，更倾向于制度对于合作有效性、实现合作目标（共识）的重要作用。

³⁶不同于基于地缘搭建的区域性合作平台，金砖合作是一种典型的跨区域合作形式。传统多边合作，地缘特征对于政治经济或安全的合作意义重大。比如，一体化进程中的典型案例欧盟、东盟等，都是基于特定地域而形成的地区一体化的合作形式。

³⁷后文中会具体解释金砖并非传统意义基于同质性的合作，其信任来自其他的因素。

³⁸脆弱性和敏感性两个概念可以用来很好地衡量不同行为体对于合作的利益、制度形式选择、信任以及偏好程度的不同。相关概念的详细分析，参阅：[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外部环境的重大震动，相关国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一致性，推动相应国家间的合作的形成。金砖各国共同面对着全球化带来的外部风险，所处国际权力格局的力量结构分布情况相似。归根结底，外生性因素（外部压力）中的核心点在于金砖各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所处国际制度环境）中制度非中性现象的感受相同，使各国具有共同的诉求与合作愿望，谋求通过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发声，从而改变权责不对称现象、维护各成员国利益、规避全球经济风险。

第一，系统外部环境，包括全球化外部风险。全球经济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全球系统性风险。当全球经济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时，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出现问题，就可能通过全球性的网络迅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宏观上看，由于经济全球化高度深化，各国经济共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上，国际经济周期的联动性很强³⁹。此外，金融体系高度全球化，诸如美国的金融风险，可以迅速扩展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金融监管的重要性空间因此提高⁴⁰。治理这些全球性的（经济）问题也绝非一国之力可以承担治理重任的，这需要各国政府、各类国际经济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跨国公司、甚至个人等各种类型的国际行为体共同合作，进行全球（经济）治理⁴¹，其中各国政府是最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提供者。

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⁴²具体来说，这些冲击包括金融冲击，如资本市场剧烈震荡，市值严重缩水；吸引外资下降和外资流出增加；货币贬值和外汇储备缩水。而新兴国家的需求也受到冲击，比如大宗商品和加工产品需求与价格下降，使这些国家出口遭到影响。此外，金融危机还对新兴国家的信心造成冲击，失业增加，收入预期不稳定，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信心降低。当然，新兴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上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受到冲击的领域和程度存在差别，因为初始条件、经济规模、经济弹性、经济结构、对外依赖度、政府资源动员能力等存在差别。新兴国家针对金融危机都出台了相应的反危机政策，比如财政、货币、产业和社会等领域的政策。同时，新兴国家也认识到，扩大国际合作尤其是新兴国家间的合作有助于提高新兴经济体反危机的政策效果。在这个意义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归属于跨国合作、参与全球

³⁹A. Fatàs, and I. Mihov, *Policy Volatility,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Mimeo, INSEAD, 2006.

⁴⁰Agnes Benassy-Quere, Benoit Coeure, Pierre Jacquet, Jean Pisani-Ferry, *Economic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⁴¹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95页。

⁴²关于金融危机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冲击以及相应的反危机政策，参见：林跃勤：《全球金融危机对金砖国家的影响》，《红旗文稿》2009年第12期，第30-33页。

经济治理的范畴，应对的是系统层面上客观存在的外部风险。

第二，体系权力结构。一般意义上，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安排应该与各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力量分布保持一致，体系的权力结构才会保持平衡。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严重滞后于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代表性与有效性都存在问题⁴³，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呼吁对全球治理的制度进行改革，使之更具合法性。

虽然以美日欧为中心的发达经济体依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但新兴经济体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日攀升，与发达经济体国家一道支撑着世界经济的增长。GDP、贸易、投资等各项指标都显示，世界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倾斜。这一现象自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更为明显。根据IMF的数据，30年前新兴经济体国家GDP占全球的28%，而截止2014年新兴经济体国家GDP占全球的50%，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30年前的21%增长到50%，投资从全球投资占比26%增长到今天的65%。⁴⁴可见，新兴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实现了重大飞越。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国家的经济步入相对衰退期。新兴市场GDP已占全球的50%，贸易量占40%，外汇储备占70%。即使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维持高位。依据IMF2014年4月的数据，发达国家将维持2.5%左右的增长率，而新兴国家将依然维持5.5%的增长率，其中亚洲的增长率依然是在7%左右⁴⁵。经济实力提高了，新兴国家为治理全球性经济危机贡献了大量的公共产品，为危机的平息做出重要贡献，但迄今为止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滞步不前，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呈现出权责不一致的现象，无法确保形成合理的报偿结构。

第三，国际制度环境。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促成合作、维护利益，但不透明、不对称、不公平的制度环境却会损害行为主体的切实利益。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制度安排）⁴⁶中的不对称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安排中存在着“制度非中性”的现象。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对不同的人意味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

⁴³ 韦宗友：《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国际论坛》2011年第2期，第8-14页。

⁴⁴ IMF数据，<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4/02/index.htm>，登录日期：2014-09-11。

⁴⁵ World Economic Outlook,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4/01/>，登录日期：2014-12-20。

⁴⁶ 田野：《全球治理中的制度供给：一种交易费用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17-22页。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4-18页。

或可能从未来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⁴⁷。制度的创设者,往往可以使制度服务于其个人利益。现有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建立在二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秩序基础之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是支撑战后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西方国家在这一治理体系创设之初,就享有议程设置的权限,决定了它们长期以来拥有的话语权优势。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性原因没有参与议程设置,在源头上决定了它们无法享有对等的的话语权,从而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经济体国家开始呼吁,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主要贡献,为治理全球性经济风险提供的公共产品也不断增多,就应当相应地拥有对称的权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合理的报偿结构。只有对现有的经济治理体系进行有效改革,才能推动治理制度安排摆脱极端的非中性特性,并朝着合理、公正和有效的方向不断发展。⁴⁸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实力增长了,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的公共产品增加了。然而,在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之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拥有的制度性权力与其经济实力和现实贡献具有严重的非对称性。例如金砖国家的人口总数占全球43%,总体外汇储备占到全球的40%,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21%,而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组织平台中拥有的话语权却极其不对称,投票份额与经济实力等因素严重不匹配⁴⁹。以世界银行为例,五个金砖国家的投票份额总数只有11.03%,而美国一个国家的投票份额却达到16.76%之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五个金砖国家表决份额的总和为11.51%,而美国一个国家的份额就达到17.69%,高出五个金砖国家表决份额总和6个百分点。⁵⁰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权责不对称现象更加凸显,国际制度的代表性与有效性都受到质疑⁵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治理效果的实现。合法性低影

⁴⁷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第97-105页。

⁴⁸徐秀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49-79页。黄仁伟:《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当代世界》2011年第5期,第24-27页。韦宗友:《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国际论坛》2011年第2期,第8-14页。吴志成,杨娜:《全球治理的东亚视角》,《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第17-23页。

⁴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份额计算公式,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chi/quotasc.pdf>, 登录日期:2015-01-10。

⁵⁰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aspx>, 登录日期:2015-01-10。

⁵¹韦宗友:《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

响到治理的有效性⁵²的案例有很多，例如伴随着 IMF 自身合法性的衰退，其行动能力也日益萎缩。⁵³

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⁵⁴

	表决份额 (Quota)	投票份额 (Vote)
美国 (U.S.)	17.69	16.75
巴西 (Brazil)	1.79	1.72
俄罗斯 (Russia)	2.50	2.39
印度 (India)	2.44	2.34
中国 (China)	4	3.81
南非 (South Africa)	0.78	0.77

借助 WTO 平台的全球自由贸易谈判难以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欧洲等发达国家主导，投票权分配存在权责不一致现象；世界银行由美国把持，发展中国家缺乏话语权。当以往的治理平台无法有效地完成全球经济治理的任务，一些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就呼之欲出了。⁵⁵

基于上述外生功能的三项因素分析，我们认为金砖国家合作起源具有体系层次的利益一致性，因此可以得出如下解释机制命题。

解释命题 1: 金砖国家随着自身实力的整体性崛起，在面对共同的全球经济风险和环境影响，以及在主流的国际制度非中性压力下，具有了更多的体系层次的利益一致性，增大了对于合作博弈的报偿判断。

2. 内生功能因素及其单元报偿结构机制

由于国家在单元层面上的差异，对于环境压力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也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国家对于合作的愿望、动力以及目标设想，甚至是利益诉求都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也可以解释在合作开展过程中，不同行为体的利益诉求、现实关注以及合作理念等差异较大。

第一，行为体数目，即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兼顾代表性。行为体数目对于集体行动产生重要影响，成员数目越多，单元报偿结构越模糊，集体行动就会越困

⁵²王明国：《国际制度研究的新进展：制度有效性研究综论》，《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2期，第41-49页。[英]戴维·赫尔德、凯文·扬：《有效全球治理的原则》，朱旭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11页。

⁵³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154页。

⁵⁴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aspx>, 登录日期：2015-01-10。

⁵⁵任琳：《金砖合作推动塑造中性国际制度》，《东方早报》2014年7月22日。

难。⁵⁶在国际合作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行为体数目也是对于合作与非合作影响重大。具体原因为有效的回报取决于三个条件，即行为体能够确定背叛者是谁，能够将报复集中于背叛者，具有长期的充分动机来惩罚背叛者。但是，行为体数目较多时，这些条件都受到限制，因此会影响合作的形成。其一，无法确定真正的合作背叛者；其二，行为体不能将惩罚集中于背叛者身上；其三，一些成员缺乏动机惩罚背叛者。如果合作的动力、压力以及目标不是那么急切（即内生不是那么强烈），行为体数目过多，则不易形成合作。⁵⁷即使合作形成后，如果要推动合作的深入，也不能依赖直接扩大成员数目的方法，而应建设成熟的制度，确保合作的制度化，为集体行动提供标准，减少交易成本，增加透明度等。同时，也可以通过将外部的成本和收益与成员的私人利益相挂钩的方法，促进行为体对于集体利益的认同。⁵⁸

在具体的金砖案例中讨论行为体数目，即思考金砖规模的问题。金砖四国合作的形成，反应了相似国际地位的四个国家数量，能够避免较多成员的集体行动困境，也使得合作的意图、成本和背叛等能较好加以识别。进一步围绕是否继续扩容，金砖内部和外部⁵⁹都存在着争议。金砖概念的提出者奥尼尔在接受采访时认为，金砖国家组织不该扩容。他强调在整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中，唯独看好金砖国家和薄荷四国（mint 包括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的发展潜力。更多的参与者意味着无法避免集体行动难题。很多情况下，各成员国的治理努力可能会受困于无休止的讨论、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推诿，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治理效率。现有金砖组织平台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它的治理效率不一定通过扩容这一条路来实现。不排斥金砖国家与其他国家、地区、治理组织平台的开放性合作，在凝聚成员国优势的基础之上，将合作推广到东亚、南亚、非洲、拉美等其他区域层面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上来⁶⁰。

此外，恰当的行为体数目也是与合作机制的代表性联系在一起的。不少人质疑南非的准入资格是否会影响金砖的代表性和行动效率。奥尼尔也曾表示南非的

⁵⁶ [美]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1-2 章。

⁵⁷ [美]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基欧汉：《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达成：战略与制度》，第 240-243 页。

⁵⁸ [美] 肯尼思·奥耶：《解释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假说与战略》，第 18-19 页。

⁵⁹ 《第一财经专访奥尼尔：金砖国家概念不该扩容》，网址 www.yicai.com，登录日期：2014-11-28。金砖国家基本上都属于各区域的新兴大国，但对于其代表性以及扩容的选择等问题都存在争议。Ramesh Thakur, "How Representative are BRICs."

⁶⁰ 徐秀军、沈铭辉、任琳：《全球经济治理：旧秩序 VS 新规则》，《世界知识》2014 年第 17 期，第 14-26 页。

经济总量、综合实力较之其他成员国来说还是非常小的，被列入金砖国家之列难免引发争议⁶¹。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金砖四国抱团取暖，对外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南非期待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作为非洲南部最重要的经济体，南非的加入也给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带来了诸多机遇。金砖国家因此也增强了在区域和全球两个层面上的影响力，通过金砖支点将全球主要区域亚洲、拉美、欧洲、非洲都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推动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进程，也体现了金砖合作机制是开放、共赢、包容的。

第二，成员国之间的功能性互补。互补性指内生的利益一致性，可能带来一致性的潜在报偿预期。互补性具体所指为经济结构、资源结构、人口结构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各行为体均能充分认识到这种功能的互补性时，能够进一步预期更大的利益一致性和合作回报。互补指标主要包括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上为相关的经济统计数据的比较，以及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分析，而主观上为行为体间对于互补性是否形成共识。

在政治或安全领域，互补性可以从其他的一些指标反应出来。比如安全合作中，行为体的实力大小的差异，也能形成安全与自主性的交易或互补，即非对称联盟的形成，就是小国牺牲自主，从而换取大国的安全保护。⁶²又或是重视组织平台的综合战略效能，例如借助组织平台，谋求与其他成员国形成跨领域的互补。换言之，各成员国对组织互补性的期待也是具有差异的，有的成员更期待组织的经济效能，有的则更期待战略效能，有的还期待提升国际地位⁶³。金砖国家成立初期专注于“务虚合作”，受应对金融危机、政治和地位领域的互补合作需求驱动较大（经济治理话语和规则权等），而到2013年之后，随着金砖政治与经济合作的并重，金砖银行等实体领域合作的启动，各国在经济领域的互补需求开始影响合作的进一步拓展。

互补性对于合作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受到外生震动的调节。比如，在外在环

⁶¹ 《第一财经专访奥尼尔：金砖国家概念不该扩容》，网址 www.yicai.com，登录日期：2014—11—28。

⁶²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s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4, 1991, pp.904-933.

⁶³ 例如印度参与金砖合作是出于多方权衡，李冠杰将印度的考量总结为以下几点：吸引机制内外资；寻找解决贸易逆差路径；从机制内学习发展经验；创造入常环境；创造处理安全问题的环境；塑造大国崛起的战略布局。后三种考量相比前面三种更加隐蔽。参见：李冠杰：《试析印度的金砖国家战略》，《南亚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9-142页。

现实世界中的合作起源是多样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排除竞争和差异。在某一维度中合作大于竞争，在另外的维度中竞争也可能大于合作。但是，面对多发的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隔离在世外桃源，合作是各国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选择。

境发生重大的变动的情况下，可能对相关国家都造成类似的影响。因此为了共同应对外在环境的变化，保证行为体的利益不受损害，合作成为一种必须的选择。2007年开始的西方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一种外生震动，促发了新兴国家联合，建立更好的全球治理机制，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同时进一步寻求内部的经济合作的互补领域。

如何实现金砖合作机制的内部稳定，从根本上对“金砖褪色论”⁶⁴进行驳斥，寻找互补性的潜在合作领域。所谓的“金砖褪色论”认为由于金砖国家内部诸如经济结构互补性并不强，加之价值观具有差异，所处发展阶段和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重叠都造成金砖合作向心力不强的局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既不可能走到欧盟一样的阶段，成为高度协调的政治经济联盟，也不大可能像一些区域内的经济联盟一样具有相同的议程，很难就某一国际议题达成一致，从而为了某一目标共同努力。金砖国家间在贸易领域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例如巴印、印中、巴南、印南之间的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及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都存在着重合现象，难以避免彼此之间发生贸易竞争。

今后稳固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途径也包括发掘和培育互补性，在各潜在合作领域内谋求金砖合作的常态化。上文所述贸易等领域内存在互补性不足的问题，但在金融、贸易和技术创新等许多行业内，各金砖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合作潜力，具有一定的互补性。特别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负外部效应”带来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中短期内下行，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寻找互补的合作领域，突出群体优势。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余波未息，各国也积极反思、探索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与贸易、金融一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设立金砖银行的初衷，正是为成员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世行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需求量在1万亿美元左右。一方面，原有世界性金融机构的贷款附加了诸多条件，为融资设置了门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投资关注点与发展中国家有区别。前者更注重能源、服务业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而后者对一些更为基础性的，例如公路、桥梁、港口、基础制造设备等的投资需求较高。

⁶⁴这种悲观的论调还从近期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历史现象中找到了它们所谓的论据，认为金砖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已经过去，中低速增长将成为长期现象，例如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以及印度卢比的跌幅很大。相关对金砖合作质疑的声音，参阅：[美]约瑟夫·奈：《没有黏结在一起的金砖》，《联合早报》2013年4月10日。江时学：《如何使“金砖”更具成色》，《世界知识》2014年第15期，第34-36页。

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直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金砖银行将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向更为宽阔的领域进行了拓展，不仅仅将合作局限在具有功能性互补的产业领域内。金砖银行的设立，将为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注入不可缺少的力量。此外，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各成员国可以谋求更多的政策协调，寻找共同语言和实现共同利益，获取安全和自主性上的互补，将有助于实现合作机制的稳定性。

基于上述两项内生功能要素的分析，我们认为金砖国家的自身内部国家和体系层面上，金砖国家的数量特性和超越互补特性的可能，增大了金砖国家间的单元报偿结构预期。因此，我们得出如下命题。

解释命题 2:由于金砖国家的成员数量较少，在对于体系层次利益一致性及其回报的更高预期之下，随着金砖国家间内部潜在互补性合作领域的拓展，金砖国家合作的单元报偿结构的判断也随之增大。

（二）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解释机制 II

第二种解释机制，是基于内生和外生规范的因素组合，即讨论体系层次的国际规范和合作文化，以及金砖国家内生的对于国家同质性以及共识的信念的形成，影响或增大了金砖国家对于合作未来可重复性的预期，避免了单次博弈所造成的非合作博弈的可能选择。认知心理学即信息加工心理学，“信息加工的认知模型为：接受信息、编码和存入记忆、利用记忆材料作出决定，指导外部行动”。⁶⁵外生规范和内生规范通过对内外部知识的储存、处理、加工、再解释，重塑行为体对未来的认识，从而影响行为体是否选择采取合作行为。

1. 外生规范因素及其未来影响机制

第一，报偿文化的预期与演进。金砖国家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属于“后来者”，它们均有体系层次上追求一种符合自身的规范和文化的愿望。这部分受到单个行为体力量不足的局限，同时也受到既有的体系对于新兴国家的接纳程度的影响。如果新兴行为体能够顺利地实现社会流动，从而消除既有体系对于新兴行为体的制约，那么很可能就是实现了既有的主导体系与新兴行为体的同一性认同。⁶⁶如果

⁶⁵ [美] 司马贺：《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荆其诚、张厚粲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第 ii-iii 页。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第 27-100 页。

⁶⁶ 在这里社会认同理论其实发挥重要的地位获得和流动的作用。王沛、刘峰：《社会认同理论

受现实利益考虑，以及地位的安排等原因制约，既有体系并没有为后来者提供合适的位置和平台，那么，这种共同的体系文化压力，会促使新兴行为体联合起来，试图塑造自身的群体身份和力量，在主导的体系文化中加入自身的规范要求。从国际制度环境以及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权力中的比重来看，自 2008 年源自西方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种环境与权力的不对等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拉大鸿沟。即便是随着 G20 机制的发展和完善，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因此，从体系环境和全球治理权力结构的视角看，金砖国家的形成及其合作的持续具有体系层面的相对较为稳定的报偿预期。

其次，金砖合作机制的选择及其演进，体现了报偿文化预期对于合作的影响。第一个方面，国家为了促进国际合作的形成，会考虑缔造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合作制度，其理论假定是相关行为体对于各自政治和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较大。所以理性国家需要设计制度化程度更高的机制，保证信息的充分性、公正性以及利益分配、合作过程的透明性等。如果相关国家间关于合作的政治共识较为明确、不确定性较小，或是更为寻求灵活而非将合作“嵌入”对报偿结构的盘算，那么，国家间合作的制度化形式就不会倾向于高制度化。⁶⁷最后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客观上构建高制度化的合作机制的现实困难程度，是否具备相应的高制度化机制设计的能力、条件等⁶⁸。在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大、成员国的政策灵活性诉求高、国家不想承担履约成本的情况下，约束性低的软机制，为国家行为体所青睐⁶⁹。基于金砖国家先前相应的渐进成功互动实践，各国对于相互意图、共同愿望等不确定性较小，而缔结高制度化的机制困难较大，所以形成非机制化的合作形式也是理性选

视野下的社会认同威胁》，《心理科学进展》2007 年第 5 期，第 822-827 页。[澳]豪格、[英]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⁶⁷交易成本分析学派对于制度形式选择的分析，强调不确定性越小则会选择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国际治理结构。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第 100-104 页。Katja Weber, *Hierarchy Amidst Anarchy: Transaction Costs and Institutional Choic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⁶⁸当高制度化的多边框架推行不下去，低制度化的治理形态就成为一种备选选项。当然，低机制化也意味着执行力低下、治理成效低等问题。目前来说，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将走向何种程度的机制化，尚未见清晰的政策表态，但不碍于总结近年合作经验，适度地巩固和推进机制化进程。在今后逐渐确定诸如合作宗旨、目标、任务、成员资格等基本要素，不急于设立秘书处。金砖开发银行体现出一定的机制化趋势，但重点仍然是落在务实合作而非建立强机制化上，需要深思一旦机制化的历史契机具备了金砖国家又将何去何从。

⁶⁹Kenneth W. Abbott and Duncan Snidal. "Why States Act through 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2, No.1, 1998, pp. 3-32. 根据我们的变量分类标准，金砖合作的制度形式倾向于是内生一功能因素，但在此我们讨论制度形式问题，一则是基于制度与规范紧密相连，制度形式体现了合作文化与规范；二则是相对于金砖成员国家而言，金砖的制度形式是体系因素，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合作制度形式分析放入了外生规范维度下的合作报偿文化影响因素之一加以讨论。

择。

国家间合作可以采取硬机制（机制化）或者软机制（非机制化）两种方式⁷⁰，软机制的治理具有非正式性和低制度化的特色，强调国家间的协商、互动的过程而非制度化的结果⁷¹，一般情况下不成立正式的组织，没有秘书处、组织章程和宗旨，只是召开一些旨在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会议，有时是首脑会，也包括财长和外长会等。目前来说，金砖国家组织的合作机制采用软机制的方式，具有非正式性，分为外长会议、财长会议和峰会等几个层次定期或非定期会议，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松散的论坛性质，至今还没有秘书处。金砖合作当前以软机制和非正式机制为主，这一方面是基于上述的各国战略意图的相对透明、信息的可辨析和控制程度较高的原因，同时也是现实的考虑，比如硬机制的难度。当然，金砖的低机制化也客观反应了金砖合作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中，较高的报偿文化预期仍未完全形成，从而对于治理效率、合作效果以及进一步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第二个方面，金砖合作的问题领域、功能的拓展，反映了金砖国家对于合作报偿预期的变化。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以 2013 年德班峰会为标志，金砖合作发展呈现两个阶段。此前的第一阶段重在“经济治理、务虚为主”的“对话论坛”，当然各国对于金砖合作的预期也有差异，比如俄罗斯偏重于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则同样强调经济治理与合作的重要性，包括五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以及金砖内部国家间的经济合作。⁷²2013 年峰会对于金砖合作的内容、深度以及机制等达成了新的共识，将金砖国家发展成为就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诸多重大问题进行日常和长期协调的全方位机制。德班峰会决定设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外汇储备库，凸显了金砖国家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入合作的实际行动。2014 年福塔莱萨峰会金砖国家就开发银行达成基本共识。金砖国家合作共有利益的拓展，合作领域的扩大，也将推动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金砖合作的主题灵活而设，根据新兴国家所面对的问题而变化。这一方面是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比如全球经济治理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等是基本的合作回报预期。当然，金砖经济合作机制的落实和深入发展，与政治地位的回报是紧密相关，这体现了“议题联系”的功能。基于报偿文化内涵的丰富和平衡，以及金砖合作向政治和经济合

⁷⁰Donald Puchala and Raymond Hopkins, "International Regimes: Lessons from Inductive Analysis," in Stephen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65. M. Virally,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 Leg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29, 1977, pp.58-72.

⁷¹杨力：《二十国集团发展报告 201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第 261 页。

⁷²朱杰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转型》，第 59-62 页。

作并重的深入，金砖合作取得了较为稳定的利益回报预期，增大了合作的未来可重复和收益的预期。

第二，完善国际规范的意愿。通过建设一种自身主导的国际制度，一方面对既有的主流制度构成一定的竞争压力，同时也是加强自身的制度规范设置和倡导能力。因此，从体系文化的目标来看，金砖合作起源于对既有体系制度的不满，同时也反应了试图塑造基于自身体系规范的愿望。⁷³前文中已提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规范中权责不一致、非中性问题的态度，具备改革完善国际治理规范体系的共同愿望。

金砖机制的产生背景，即金砖国家对外部世界的共识性反应，显示了完善公正国际规范的意愿。金砖成员国的内生共识汇聚成为集体共识，依照集体共识对外部规范体系做出共同反应，直接影响到成员国对未来影响的认知结构和判断方式，关乎合作的持续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原有治理平台中的制度非中性现象依然严重。在这种背景之下，新兴经济体国家亟需自己的治理平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同时，呼吁改变原有治理结构中非中性的问题，使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切身权益得到更全面的反应。⁷⁴金砖国家则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平台而出现。目前来说，金砖共识取得了不少成果，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在谋求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在金砖各成员国的积极努力下，2014年峰会金砖发展银行正式成立。

基于上述金砖国家合作的逐步外溢的分析，我们认为金砖国家合作具有一定的重复合作的规范文化，因此增强了金砖国家合作对于未来可持续性的信念，同时构建一种更为成熟的国际规范文化的共同愿望及其可能，为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奠定了体系未来影响的可预期机制。因此，我们得出如下命题。

解释命题 3:随着金砖国家间构建成功国际规范文化体系共同愿望的形成及其渐进成功实践，金砖国家的合作博弈的相对成功也增大了未来可持续合作的预期，因此合作博弈成为理性的选择。

2. 内生共识因素及其未来影响机制

⁷³金砖国家正式成立的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中，呼吁二十国集团落实共识，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200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2009年6月17日第3版。

⁷⁴李巍：《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第33-40页。蔡春林：《金砖国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转型》，《亚太经济》2013年第5期，第8-13页。

第一，成员国之间的认知同质性。同质性的主要指标有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差异等⁷⁵。同质性促进国际合作的形成，其基本的理论逻辑在于相似国家间更容易产生合作的愿望和需求，同时基于国家同质性的接近，初始合作的信任也更容易形成，合作过程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也更小。第一个指标是意识形态因素，即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等），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及其认知以及互动将会增多，而意识形态的相近性，也能够让相关国家产生更多的先验情感信任。所谓的“民主和平论”、“民主少冲突论”⁷⁶、“民主合作论”就是遵此逻辑。尽管具有一定的市场，现代国际合作的多元化已经逐渐打破这种同质和平、同质合作的论说基础。第二个指标是经济发展模式，侧重于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合作。由于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可能以及机会将增多，同时，由于相应的经济发展制度和模式的相似性，也会导致国家间更容易在经济领域寻找合作的机会。最后是文化价值观的指标，表明国家间的文化价值观越相似，则越有可能促进、引发合作的可能，因为文化价值观会拉近相关国家间的身份距离，有利于构建更为一致的集体身份。文化价值模式的一致，也促使相关行为体能够消解在合作起源中意图的不确定性，有利于行为体对于利益和身份的清晰界定。

有时候，金砖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也会引发外界对金砖合作机制稳定性的担忧，例如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国情不同、地缘政治状况不同。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融合各成员国不同的利益诉求，也是金砖合作的一大挑战。在金砖银行先期资本投入额度、银行负责人人员、金砖银行组织架构、股东权责以及总部地址的选择等实质性问题上，金砖国家进行了有效沟通。⁷⁷如果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中国作为其经济实力最强、国际影响力最高、出资比例最高的国家，应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投票权比例。但是中国从合作大局出发，作为金砖发展银行的主要发起国及出资国，为了改变旧有经济治理秩序的不公平现象，倒逼国际金融治理秩序的变革、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秉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制度设计与安排上做出了牺牲和让步，为金砖合作机制的长期稳定性做出

⁷⁵意识形态或国家属性一致性成为诸多合作的基础。尤其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同质性的强调，成为合作的一个潜在的国家假定。在此基础上，诸如民主信任论、民主合作论等，都是强调民主国家的相似性，更有利于形成基于意识形态的国家间多边合作。此外，冷战时期的阵营对立，也同样体现了意识形态同质性的重要性。

⁷⁶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丁韶彬：《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三角和平论评析》，《欧洲研究》2004年第3期，第54-64页。

⁷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萨宣言》，《人民日报》2014年7月17日第2版。

了重大贡献。⁷⁸最终，金砖各成员国能够克服既存的差异与分歧，协力推动金砖发展银行的建立。目前，金砖发展银行的负责人来自印度，总部位于上海，高层管理人员分别来自俄罗斯、巴西、印度。⁷⁹金砖银行从筹备到2014年宣布成立，都体现了金砖机制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诉求认知的同质性的合作特点。

金砖国家同质性客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各异，而且文化差异也较大，经济发展模式等也存在相应的竞争性。但从同一性认知来看，金砖国家同质性差异的认知，被共同的国家身份，即新兴地区大国（面对共同的体系压力和共同的愿望），以及相应的地位追求和利益保护共识所超越。

第二，内生共识。内生共识和信任，对于合作而言是最为微观的基础，主要包括地位共识（包括对现行制度公正性、包容性、排他性的认识）、身份共识和利益共识，此类变量体现了国家能动性对合作形成具有塑造力。制度共识即现有的国际制度的非中立特性，导致新兴国家群体在崛起过程中，在制度、规范和话语等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此情境下，新兴国家群体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是加入到主流的国际制度当中，分享既有国际制度/规范的权力，要么是新兴国家群体另起炉灶，成立自身的制度。因而，金砖国际合作事实上是获取、影响和塑造国际规范/制度权力的一种途径。⁸⁰

首先，地位共识。新兴国家属于各区域的大国或新兴崛起国家，作为相同身份的新兴大国群体，金砖国家的合作有助于巩固各自国家在地区的影响力，彰显区域和国际地位。地位的追求，成为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非物质性目标。特别是对于国际社会中的新兴崛起行为体而言更为重要。⁸¹由于后发优势，从经济上来讲，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发展迅速，因此经济上的迅速崛起，让新兴国家迅速重塑了先前的国际经济权力结构。但是，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并不是对等的，金砖成员国均对既有国际体系的公正性和代表性不满。经济上的成就，并不能直接带来相应的政治地位。为了追求更好的国际和地区地位，包括地区的

⁷⁸林跃勤：《金砖银行：重构国际金融新秩序》，《光明日报》2014年10月15日第15版。

⁷⁹目前的金砖机制设计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如建立健全完善的争端仲裁与危机处理机制，是未来金砖合作机制内部妥善应对争议，防止内部冲突、凝聚共识的重要保障。这标志着金砖合作机制在政策落地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

⁸⁰Adriana ErthalAbdenur, "Emerging Powers as Normative Agents: Brazil and China within the UN Development Syste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5, No.10, pp.1876-1893. 关于金砖国家行为体如何塑造国际规范的反向社会化分析，参见：Pu Xiaoyu, "Socialization as a Two-way Process: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No.4, 2012, pp.341-367.

⁸¹Deng Yo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Debora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4, 2010, pp.63-95.

影响力、国际规范的建设者等，新兴国家合作的愿望会比较强烈。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离不开开放、公正、公平的中性国际规则。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能够凝聚更多的共识，代表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大力呼吁改革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承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其体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⁸²

其次，身份共识。合作所形成的一种团体身份，即新兴大国群体，对于金砖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身份建设意义，也有利于金砖国家应对体系所主导的话语和规范压力。如何在既有的体系中获得相应的合法性，这决定着新兴国家在崛起过程中是否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获得自身的体系和地位目标。金砖国家对自身、对合作机制的身份定位是否清晰，也决定了上述的目标能否实现。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金砖国家的身份共识总结起来是共同面临自身、组织内、区域内和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承担重要“支点”作用的新兴国家。在几次领导人峰会的议程和达成共同宣言的内容上，金砖成员国的身份共识清晰可见。

主导的体系国家和国际制度，对于新兴国家的身份一般持两种态度。要么是持社会接纳的态度，即将新兴国家纳入到自身的体系当中，要么是持排斥态度，即在体系的规范和文化中，将新兴国家拒之门外。这当中又夹杂着复杂的利益考虑，比如既有的国际制度希望新兴国家更多承担国际责任，而较少享受独特的体系规范主导和话语权等。⁸³而且，能否顺利成为既有国际制度的主导者之一，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是否是经济上的有力竞争者，是否是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是否是同质性相同的国家成员等。基于成为既有体系成员所具有各种困难，金砖四国愿意加强在能源领域、社会领域、教育和科技领域的合作，致力于推动多边外交，支持联合国在应对全球威胁中的中心作用；强调并支持，在国际法治、平等合作、互相尊重、由各国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建立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⁸⁴

在一些特定的外生环境震动的情况下，比如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处于相似国际地位的新兴大国，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的一种高层

⁸² 《“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2009年6月16日）。

⁸³ 苏长和：《中国与全球治理——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5页。

⁸⁴ 《“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2009年6月16日）。

的共识。⁸⁵新兴大国既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也遭受到全球金融风险损失的损失，而在既有的全球治理结构中，又缺乏对等的国际规范和制度的倡议和执行权利，这种情境客观上成为新兴大国身份确立的外在条件，换言之，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和规范成为新兴大国身份的“他者”。此外，金砖的集体身份还体现在在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集体推动了 G20 成员国领导人于 2009 年匹兹堡峰会上达成共识，同意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IMF 所占的份额；中印巴南非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集体发声，对发达国家提出完成京都议定书二期减排的要求；成立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金，为基础设施投资奠定资金基础等⁸⁶。

最后，利益共识。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和规范的不平等性，也会导致相应的利益难以受到保护。新兴国家对于利益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既有体系和制度的非平等性，相关的行为体在国际制度和体系的交易中往往不能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⁸⁷另一方面，在新兴国家的内部，也需要较好的合作及其制度，对相互间的交往进行更多的规范和制度保障，从而促进自身内部的利益增长。“‘金砖四国’对话与合作不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⁸⁸

制度、地位和身份共识，决定了不同的制度建设，地位安排和身份建构，产生了不同的利益界定以及利益互动。特别是，对于已经在国际经济权力格局中占据较大份额的新兴国家而言，如何在制度、规范和文化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寻找到符合自身实力的制度格局，对于维护新兴国家的利益而言，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⁸⁹因此，在对既有的体系制度和文化进行调整，从而维护自身利益方面，新兴国家具有较大的共识。基于上述两个内生规范要素的分析，我们认为金砖国家对于自身国家类型属性的认知及其在身份、地位、利益共识的逐渐形成，对于金砖合作的形成及其发展具有重要的未来可持续预期影响。因此，我们得出如下命题。

⁸⁵Ramesh Thakur, "How Representative are BRICs."

⁸⁶高尚涛：《实践理论与实践模式：中国参与金砖国家机制进程分析》，《外交评论》2015 年第 1 期，第 55-68 页。

⁸⁷现有的国际制度大多是霸权主导下的产物。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⁸⁸《“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2009 年 6 月 16 日）。

⁸⁹制度和规范的竞争，成为新兴大国与既有的发达国家之间战略博弈的重要内容。关于制度竞争的相关研究，李巍：《国际制度竞争，中美新式软竞争》，《环球时报》2013 年 11 月 21 日。

解释命题 4: 随着金砖国家间关于自身内部的地位、身份和利益共识的逐步增大, 在既有的体系压力和共同改革体系规范的愿望下, 金砖国家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较大的现实, 进一步增强了金砖国家合作的未来可持续的预期。

四、结论

金砖国家的合作具有系列的特性, 比如非制度化、超越国家同质性的差异等。金砖国家也是中国自身主动参与缔造并发挥重要的规范建设作用的国际组织之一。⁹⁰从理论和现实维度来看, 如何阐释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 是十分重要的学术命题。本文并未追求单因论的理论解释, 因为基于金砖合作理论起源研究的相对较少, 以及单因论容易走向理论的片面性的考虑, 我们探究了系统的解释变量类型的归类, 并相应承接合作起源的作用机制, 探讨不同维度、层次和属性的解释变量的作用过程。⁹¹在此理论解释框架下, 体系和单元层次的报偿结构预期以及外生和内生未来影响认知, 成为金砖合作起源的两种核心作用机制。

本文在系统阐释合作起源理论的基础上, 将金砖国家合作起源的解释因素和作用机制链接起来考察, 回答了不同的因素通过不同的机制作用于合作的形成。从理论意义上来说, 本研究具有如下层次的价值。

其一, 相对于先前较多的对抗型合作类型⁹², 我们重点转向了功能型和发展型合作的解释, 并且试图凝练合作博弈的基本逻辑, 阐释合作博弈中的集体理性和利益的起源。这既梳理了金砖国家的合作特性, 同时也是对于先前合作类型及其前提认识的推进。

其二, 金砖国家的同质性存在较大差异, 而且也有声音质疑金砖国家的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金砖国家是与西方主流的国际制度假定之一, 即同质国家合作论是有区别的。⁹³无论是民主和平论、民主信任论, 还是国际制度的理性缔造等组织理论, 包括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对外民主改造实践, 均持民主国家是合

⁹⁰中国总体的态度是参与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 相关概述参见: 王逸舟主编: 《磨合中的建构: 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年。

⁹¹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 应该是揭示因素和机制的综合统一。基于社会事实的复杂性考虑, 我们认为单因理论往往过于强调单维度因素的因果作用, 而忽视了其他的要素。关于因果关系和机制分析的理论思考, 参见: 刘骥等: 《社会科学为什么要寻找因果机制?》, 《公共行政评论》2011 年第 4 期, 第 50-84 页。

⁹²对抗性合作包括联盟等国际合作类型。关于国际制度的形式划分, 参阅田野: 《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 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 第 120-166 页。事实上, 近现代功能性国际组织和地区一体化都是功能性合作的经验表现, 但我们认为金砖有其他特殊性, 是跨地区、跨意识形态、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兴大国联合体。

⁹³西方主流的合作理论以及群体和谐理论, 对行为体的同质性均甚为看重, 比如民主和平论、社会认同理论等, 而且大部分都是对于先验的同质属性相似的强调。

作（特别是有效合作）的基础条件的论断。同质性合作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也造成了合作的封闭性、排他性，从而不是一种包容和多元的合作。金砖国家合作超越了国家间同质性差异，创造了多元和包容合作的范例，单元的功能因素以及内生规范发挥重要的合作促进作用。⁹⁴

其三，国家的能动性对于合作起源和发展的作用。与简单的强调结构压力的合作起源不同，金砖国家合作起源解释中，还可以看到国家的策略选择和认知的重要性，比如国家间互补性的发展和调节，国家间对于利益一致性的判断和塑造，以及塑造一种良好国际规范的预期，关于同质性同一性的知觉以及身份、地位和利益共识的增强等，都有力地促进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形成。⁹⁵实际上，金砖国家合作的起源体现了国家的能动策略。

其四，传统合作起源的理论解释，大多是因素解释，讨论各种理性和有限理性因素是如何作用于合作的共同愿望和默契的形成。本文的研究综合了因素和机制的解释框架，进一步将四种维度的原因变量及其作用机制剖析出来，因此这是一种动态的因果解释理论，强调因素和过程的结合。

合作的起源及其理论解释，实际上包括更多细微的问题，比如合作何时形成，是否有一种因素是最为核心的，合作机制的选择问题以及金砖对于国家自主性的影响等。⁹⁶我们关于金砖合作起源的解释，未来可在若干领域深化，如金砖国家合作为何是 2009 年形成，金砖合作为何选择非制度化机制的形式，在本文所提出的四类作用机制中，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等等。未来研究的开展，需要进一步综合借鉴组织社会学和行为学、制度理论以及合作情感等方面的前沿成果。

The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BRIC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⁹⁴苏长和：《中国与国际体系：寻求包容性的合作关系》，《外交评论》2011 年第 1 期，第 9-18 页。此外，巴西里约天主教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阿勃德奴尔教授（Adriana Erthal Abdenur）在谈论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问题时，提到了中国发挥关键作用的必然性，但也应避免独享议程主导权。实际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谋求的也是平等的多边框架，正如金砖发展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但行长来自印度，这些安排最终还是体现了成员国之间的妥协和让步，决议过程也维持了多边主义、平等协商，而不是非一国独大。参见：<http://www.CRNTT.com>，登录日期：2014-07-15。

⁹⁵这一点是不同于无政府体系下的非集中合作理论以及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制度理论的。[美]肯尼思·奥耶编：《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Barbara Koremenos, Duncan Snidal and Charles Lipson eds., *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⁹⁶国际合作对于国家自主性的影响，最新研究参阅：田野：《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Abstract: The BRICs has become one important forum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ut it is underdeveloped in Chinese IR field in terms of the question of origin of cooperation among BRICs. The cooperation among BRICs origins from the state agency and practice under the external circumstance, in which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logic includes four kinds explanation variables based on the dimensions of function-norm and endogenous-exogenous, and their counterpart judgment mechanisms of the structure of system and unit reward,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influence mechanisms.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non-neutral trait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rising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BRICs, the interdependence among BRICs states grows quickly, and then their consensus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terests transcends the difference of homogeneity among the BRICs, which results in the organizational trust of alliance, and the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development of the BRICs.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BRICs betters the knowledge of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functional and developmental cooperation,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based on unit homogeneity, and stresses the vital role of the agency of the BRICs in cooperation game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model with both variable and mechanism. In terms of the issue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BRICs, the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 of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BRICs has its own policy implications.

Key words: Cooperation; The BRICs; Functionalism; Normative; Endogenous; Exogenous

免责声明:

本报告为非成熟稿件, 仅供内部讨论。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所有, 未经本中心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我们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联系邮箱: deuyut@163.com